

高句丽考古研究

耿铁华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高句丽考古研究

耿铁华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高句丽考古研究/耿铁华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

12

(吉林文史出版社学术文库)

ISBN 7—80626—X

I . 高... II . 耿... III . 高句丽—古代少数民族考古—中国
—文集 IV . 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2430 号

半封套

民 51 李 1005

高句丽考古研究

耿铁华 著

责任编辑:吴 燕

封面设计:范 犁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7.75 印张 445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通化师范学院照排印刷中心 印数:1 000 册 定价:45.0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626—X/G·318



洞沟古墓群发掘（1984）



禹山3319号墓室（1997）



冉牟墓墓室测绘（1994）



李享求先生陪同考察中原高句丽碑（1993）



与日本考古学家三上次男在宴会上（1985）



讨论文物修复（1993）



与方起东先生陪朝、韩学者朴时亨、赵由典、李亨求等集安考察（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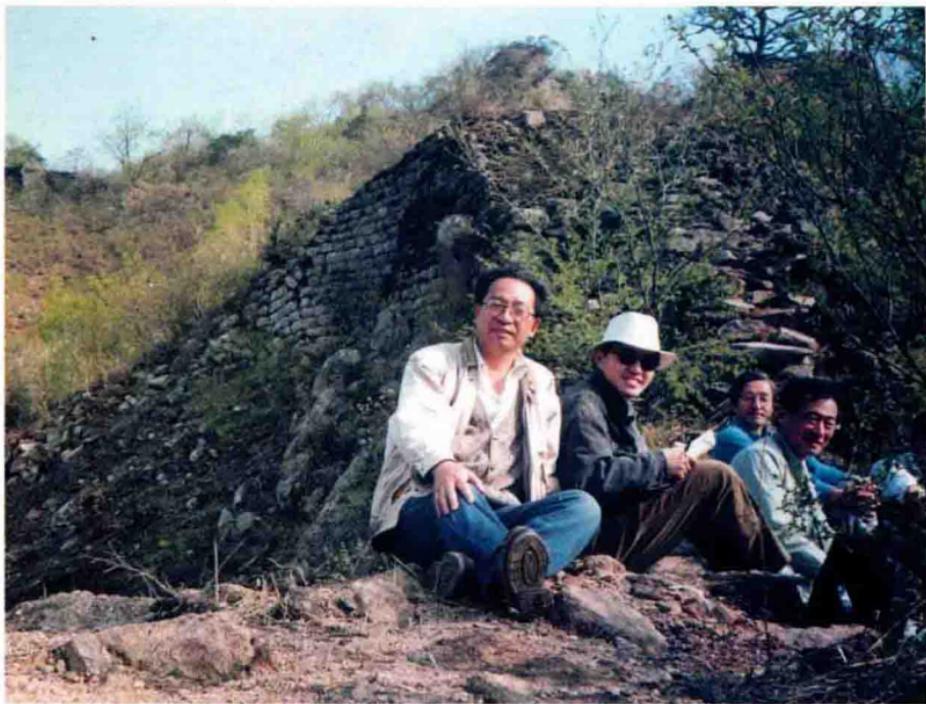
与方起东、李亨求、孙仁杰、张雪岩在千秋墓上（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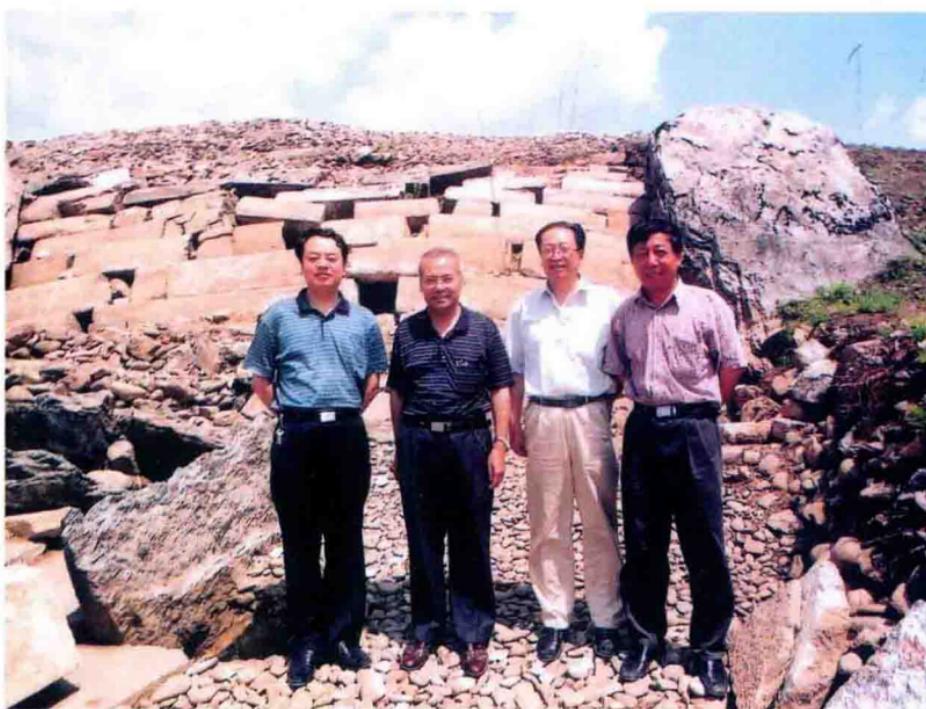
与庆州博物馆馆长李兰英交谈（1993）



陪考古学家蒋赞初、彭士凡、郑杰祥考察将军坟（1986）



陪日本学者考察凤凰山城（1997）



与张福有、彭庆会、傅佳欣在太王陵工地（2003）

自序

高句丽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是以高句丽文物遗迹的调查、发掘为基础,进行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与完善,同时对文化遗迹进行分期、分类、断代研究,促进高句丽历史研究的进程。

我国的高句丽考古,发端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形成于 80 年代。一方面,我国东北是高句丽民族起源、建国、生存、活动的主要地区,吉林、辽宁两省的东部是高句丽故都之地,有都城、山城、古墓、壁画、碑碣、石刻等遗址、遗迹,出土了大批的石器、陶器、金银器、铜器、铁器和鎏金器,是我们调查、发掘与研究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一批学者为高句丽考古事业,克服重重困难,默默地工作,无私地奉献了青春和年华。他们的代表有陈大为、王承礼、方起东、李殿福等先生,陈、王二位先生已作古,方、李二先生病休在家,仍不忘高句丽考古事业的发展。

辽宁省的桓仁、吉林省的集安是高句丽政权两座都城所在地,

也是我国高句丽考古事业的发祥地。1956年春,为了配合桓仁水库修建工程,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陈大为等前往调查,发现古遗址24处,高句丽墓葬750座。1958年秋至1959年春,陈先生对连江、高力墓子村的7座古墓进行发掘——这是我国高句丽古墓考古发掘之始。从此陈先生对高句丽古墓进行调查、发掘、分类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观点。直至晚年,仍在进行高句丽古墓和古城的研究。

1958年春夏之际,吉林省博物馆苏楠、苏才二位在集安清理了东台子建筑遗址,则开了我国高句丽建筑遗址发掘之先河。迄今,东台子遗址在高句丽考古研究中仍然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1961年前后,特别是国务院将集安洞沟古墓群(包括好太王碑)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时。担任吉林省博物馆副馆长的王承礼先生十分重视集安高句丽文物遗迹的保护、调查与发掘工作。他曾多次带领方起东、李殿福、韩淑华、刘萱堂等到集安调查、发掘,先后清理发掘了通沟十二号墓、五盔坟四、五号墓、麻线一号墓。这几座高句丽壁画墓的发掘报告公布以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接着中朝联合考古队对东北的高句丽、渤海文物遗址进行调查、测绘、拍照。王承礼、方起东、李殿福先生在高句丽考古发掘与研究中的成果,为我国高句丽考古事业的发展,为我国高句丽考古学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王承礼先生早年毕业于东北师大历史系,是我的先辈。我的导师徐喜辰、吴枫先生生前常讲起他学术精进,为人和善。在历史系学习时,王承礼先生给我们作过学术报告,指导我们在省博物馆参加陈列展览。我到集安博物馆时,王承礼先生是文博界的领导,十分关心我的工作和研究。先生的教导鼓舞着我战胜困难,坚持学习与研究,在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中不断作出成绩。

我是1982年末到集安博物馆的。虽然在读先秦史研究生时,张忠培先生曾系统地讲授了旧石器、新石器时代考古。在西安、洛

阳、安阳、郑州、武汉、南京等地博物馆、考古工地进行实践时，也听过文博界前辈武伯伦、史树青、蒋若是、杨锡章、郝本性等先生的讲课。大都是新石器和三代考古的内容，同高句丽考古与历史的差距太大了。对于一个未知学科和领域，只有认认真真地从头学起，或谓之补课，这一补就是整整十五年，又一个学科的大学和研究生毕业了。

从我在《文物》1984年第1期发表高句丽考古文章算起，整整二十年了。期间我发表的百余篇论文大都以高句丽历史与考古为主，从中选出30篇作为高句丽考古研究论集，实在是想进行一次阶段性的总结，以为下一阶段深入研究之准备。

在本书编选中，我深深地体会到，我的高句丽考古研究成果得益于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习、实践的机遇。我到集安不久，赶上了两次学习与实践的好机会，这对我的学习和研究是至关重要的。1983年，吉林省各市县文物志编写与普查工作全面展开。经过短时间的统一培训之后，我和傅佳欣各领一队对集安岭前岭后的文物遗迹进行全面调查，采集文物，形成资料，然后交换复查。不仅发现一批新的遗迹、遗物，还对集安境内高句丽建国前后的文物分布有了全面地、深入地了解。与此同时，对馆藏文物进行清点、核查，选编成集安文物志稿40余万字。

1984年春，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高句丽古墓发掘开始，至1985年秋结束，我和林至德、孙仁杰、迟勇、张雪岩、柳岚、王洪峰一起发掘了113座古墓。此次发掘的古墓数量多、类型全，出土文物丰富、完整，组合有特点，是已往发掘中难以见到的。我幸运地参与了发掘管理和实践，掌握了高句丽古墓发掘技术、程序，对高句丽古墓的类型、年代、出土文物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为后来的高句丽文物保护维修、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高句丽考古研究的良师。1983年春，全省文物普查及文物志编写培训班在德惠开班，我作为学员，认真听取了各位老师的讲课。其中方起东、李殿福先生讲述的高句丽考古，集安文物调查与文物志编写意见使我受到教育和启发。之后，方起东、李殿福二位先生亲临集安指导，接触频繁，获益良多。特别是方起东先生，1983年内多次到集安并一同调查关马山城、大川哨卡、二道崴子、东村等遗址。还与《文物》杂志社的编辑朱启新、李丽到集安组稿。我执笔的《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就是在方起东先生指导下完成的。此后，方先生每年都要来集安几次。在他的关怀指导下，我们顺利地完成了高句丽遗址保护调查、古墓发掘、古墓维修等多项任务。从中学习到高句丽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经验，也学习到领导工作的艺术。

其三，坚持有计划地学习与研究。集安博物馆和文管所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既要搞文物保护管理、调查发掘，又要搞陈列展览、参观接待、文物收藏、档案管理、历史研究。同时又要参与地方上各项工作与社会活动。每年还要接待上级领导、文物主管部门、业务指导部门的检查指导、参观考察，兄弟单位的交流学习等等。馆内业务人员不多，每人每周得下片跑文物保护二、三天。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各自分管的墓区检查、走访，一跑就是一天。如果赶上文物调查、考古发掘，则连续地早出晚归，或干脆住在乡下工地。文博界的人，由于工作辛苦，时常在野外，加之接触古墓和文物，大都养成喝酒、神聊等习惯。看书学习和研究的时间很少，学校学到的东西也慢慢地淡忘了。

我作为博物馆的业务负责人，坚持自己学习并组织业务人员进行学习，有计划地研究，写文章。我与孙仁杰、张雪岩、迟勇等研究发掘报告的整理，高句丽文物与古墓壁画专题研究。在《文物》、《考古》、《考古与文物》、《北方文物》、《辽海文物学刊》、《博物馆研究》等杂志上发表了一批有特色的论文。还主编出版了《高句丽研

究文集》。使集安博物馆的保护管理、科研工作出现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们同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这种学习与研究的风气对我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和困难,我都是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写作来充实自己。至今已养成了习惯,一天下来,若没看书,没动笔,是睡不安稳的。

多年来,我在高句丽的历史与考古研究方面得到许多良师益友的支持和帮助,收获了一些体会、心得之类。我坚持历史文献、考古资料为依据,相互印证,相互比较,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重视经济类型、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的研究,进而扩大到社会生活与历史。而于碑刻文字、古墓壁画、古城遗址、馆藏文物也多有用心。然后形成文字,形成一家之言。诸如高句丽起源于商人,高句丽人农业兼营渔猎的综合经济类型,高句丽人由原始生活进入汉代封建社会,好太王碑及拓本研究,冉牟墓志研究,高句丽釉陶器的类型与分期,高句丽瓦当的年代等等。通过调查与研究,对一些传统的观点也提出了质疑,如“五女山城是纥升骨城”,“高句丽是否有封土洞室墓”,“太平五道岭沟门古墓”等。有些问题尚需进一步考证研究。

日本学者曾认为我在高句丽考古研究中涉及领域广泛,观察问题独特——这也正是我努力的目标。然而实践起来并非易事,也会出现失误。1989年,我在《文物春秋》上发表了《高句丽文物古迹四题》,其中谈到了将军坟的陪坟,有认为“五座陪坟”,也有认为“四座陪坟”。我根据《通沟》一书附图的尺寸和将军坟整理环境时的遗迹判定为“四座陪坟”。1997年秋,我与张雪岩、周荣顺、王洲雁对将军坟陪坟进行清理,清理出第二座陪坟的基础,结构、规格略同于第一座陪坟。第三座陪坟基础靠近第二座陪坟,且非正方,而是长长一串阶坛一直延伸到墙脚。究竟是“串墓陪坟”,还是“祭台”,存在分歧意见。不管是什么性质,以往推断的“五座陪坟”

或“四座陪坟”都被证实是不准确的。看来高句丽王并非按照等距离、对称等规律安排陪坟或其他祭祀建筑。

考古发掘的成果是真实可信的，有时也是不规律的，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也许正是高句丽考古研究的魅力所在。唯其如此，我将不遗余力地探索和研究，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做出更好的、更可信的回答。

2004 年 10 月

目 录

自序	1
高句丽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	1
高句丽建国前的考古学文化	60
集安高句丽农业考古概述	82
高句丽纥升骨城新考	95
访高句丽霸王朝山城	111
高句丽墓上建筑及其性质	117
高句丽王陵及相关问题研究	136
高句丽古墓的几个问题	154
集安高句丽古墓壁画及其保护	172
集安五盔坟五号墓藻井壁画新解	205
高句丽壁画中的社会经济	216

高句丽壁画中的贵族生活	229
高句丽壁画中的军队与战争	239
高句丽壁画中的宗教与祭祀	250
高句丽壁画四神图及其文化渊源	266
高句丽贵族冉牟墓及墓志考释	299
高句丽冉牟墓研究	309
冉牟墓志集释	337
中国学者对好太王碑的研究	353
好太王碑文烟户、奴客诸词语补释	372
王少箴旧藏好太王碑拓本及其年代	381
好太王碑拓本收藏著录及其年代	397
好太王碑 1590 年祭	428
中原高句丽碑考释	445
毋丘俭纪功碑考略	455
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	459
高句丽釉陶器的类型与分期	481
集安出土的高句丽瓦当及其年代	506
高句丽兵器研究	525
集安市新出土的几件高句丽文物	552
后记	556